

发展的故事

幻象的形成与破灭

TALES OF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Illusions

叶敬忠 著





发展的故事

幻象的形成与破灭

TALES OF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Illusions

叶敬忠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发展的故事：幻象的形成与破灭/叶敬忠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8

ISBN 978 - 7 - 5097 - 7020 - 7

I. ①发… II. ①叶… III. ①社会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3601 号



发展的故事：幻象的形成与破灭

著 者 / 叶敬忠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韩莹莹

责任编辑 / 韩莹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6.5 字 数：377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020 - 7

定 价 / 7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绪论 大学、知识分子与社会研究的故事·····	1
1 商品的故事：当农民双脚站在市场经济之中·····	39
2 留守的故事：农村被切开的血管·····	68
3 学校的故事：为了城市化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	88
4 土地的故事：“被上楼”的农村、农民与农业·····	116
5 农业的故事：没有小农的世界会好吗？·····	134
6 粮食的故事：关于饥荒与涨价的悖论·····	154
7 食品的故事：小农小生产与工业大生产之祸福·····	185
8 科学的故事：现代科学技术对农业的规训·····	208
9 技术的故事：关于转基因技术的论争·····	229
10 自然的故事：经济增长中的环境迷雾·····	247
11 灾害的故事：当重建成为发展的契机·····	267
12 慈善的故事：NGO 是草根天使，还是精英代理？·····	289
13 援助的故事：救穷抑或为己？·····	312
14 项目的故事：发展干预的权力滴流误区·····	339
15 我们的故事：遭遇发展与发展研究·····	360
参考文献·····	380
后 记·····	419

绪论

大学、知识分子与社会研究的故事

本书是我在“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这一领域学习、思考和实践近 30 年的结果汇报，但能够最终成书却是缘于我自 2011 年为发展研究专业的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发展概论。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性专业不同，发展研究是领域性专业，其本身还很难说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因此，开设一门基础概论课程实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我便讲了许多有关发展的故事。这倒不是向当今大学课程继续“放水”，而是期冀从“应试工厂”里走出来的年轻学生在聆听故事的过程中，找回他们的年龄应有的思考的灵性。这些故事都是世界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主题。其中，我对有的主题开展了长期的研究，对有的进行了长期的关注和思考，对有的进行了广泛的阅读。在几年来的课堂实践中，我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以批判的视角向学生进行了讲述，并得到学生的积极回应和反馈。学生认识到，对这些重大主题的反思，更好地体现了对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深深关切。这进一步促使我对这些主题进行梳理和总结，同时对我在发展研究领域浅尝多年的学术经历进行小结。由此，便攒成了拙作。

在对本书所选主题进行讲授和论述时，我经常被问及，为什么采取如此视角、如此思考、如此分析、如此立场等。这其实源于我对自己的机构——大学、自己担当的角色——教师（尚不知能否称为知识分子）、自己开展的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因此，遇到上述疑问时，我总愿陈述自己对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开展社会研究、如何分析社会问题的看法；在课堂上，我也愿首先讲述自己对大学、知识分子和社会研究的认识。这其实是为学生或读者聆听或阅读后面的故事做的铺垫。但我深知，大学和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两大学术领域，许多学者倾其一生研究它们，论著已汗牛充栋。除此之外，但凡大学者都愿意表达他们对大学和知识分子的观点。因其影响力巨大，故社会传播广泛。在学习关于大学和知识分子的论著时，我每每感慨不断，共鸣不已；也常常临文思今，抚膺长叹。这里呈现的主要是我的学习心得和阅读笔记，谈不上有什么自己的观点。而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本身，仅论述社会研究方法论的著名学者和论著就不计其数；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大学者更是不可胜数，他们的论著也都成了经典。这里展现的只是我深有同感的话语摘录，也谈不上有什么自己的经验。

一 大学

大学教授的工作主要包括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然而，当今大学普遍重科研、轻教学，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似乎非得有上级的明文规定才能勉强实现。也有人问我：“科研工作非常繁忙，还坚持给本科生授课，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其实，这本不该成为问题，但现今社会似乎的确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本来很平常的事情反倒成为不平常，而本来不平常的事情反倒成为平常。以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为例，首先，这是大学教授应尽的职业责任，本来就是义务，乃分内之事。其次，“教是最好的学”，教学是提高教师自身能力的重要途径，如古人所云：“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礼记·学

记》)再者,我把课堂看成是一块阵地,一种思想不去占领,另一种思想就要去占领。这一比喻不一定合适,但课堂应该是各种思想与观点碰撞的竞技场,我希望自己所崇尚的思想能够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为本科生上课需要对现实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是,我面对的大学生群体已经今非昔比。当今社会十分推崇与世推移、与时俯仰的从俗哲学,在“物欲狂欢横扫中国,国人陷入精神贫困”的大背景下,大学生已不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天之骄子,很多变成了“两耳尽皆窗外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谢湘、堵力,2012;钱理群,2012)。一名湖北的大学生曾尖锐地指出:

这个时代,大学生差不多早已变得不大会说属于自己的话了。从进大学的那一天起,我们就不断被教导、被灌输、被暗示、被诱逼,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见到甲该怎么说,见到乙该怎么说,在台上该怎么说,在台下该怎么说。……告别权威,他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盲从社会,迷信流行,没有自己的观点,缺乏智慧的思想。……他们在实践中追随一种普遍流行的服从,……形式化的思想行为正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一些人寻求生活的刺激和伪先锋式的潇洒,一些人醉心于“理论联系实际”所获取的可观报酬,他们过早地走进了商业操作的流程。(一名湖北大学生语)(钱理群,2008:222-223)

资深媒体人老愚先生的一次研究生面试经历,令其感触尤深、唏嘘不已:

他们翩然降临。男的潇洒,女的优雅,咋看都有一种范儿。我决意从两个方面考察他们。一是基本阅读,二是价值观。……看简历,以为天下英才俱在手中,面试后,始知教育产业毁人不倦。……该学的都没学会,却全然丧失了应有的纯真。无知识谱系,无正当价值观。……毕业论文一概是那种无需动脑子的傻题

目，一个自我循环论证的僵尸。……在回答政治问题时，他们应对有方，操着一套熟练的正确话语，眼神炯炯，话语滔滔，肢体语言丰富，堪比外交部发言人。（老愚，2011）

在这样的现实和功利社会里，很多大学生不知不觉地依照效用理论来安排自己的学习、规划自己的未来。大学生经常提出如“学习这个有什么用处”“学习那个能找到工作吗”等问题。此时，大学教师，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师，十分需要思考大学到底应该或者能够提供给学生什么。对于社会学、人类学、发展研究等这样的专业，大学教师能够教授的无非三种形式的内容，即信息、知识和思想。但我认为，大学提供给学生的不应该是信息。现代社会的信息林林总总、真真假假，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们已经被信息围困，难以喘息、苦不堪言。信息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例如，任何一个以往需要翻阅词典的术语，只要百度一下，哪个也不下数十万、数百万条，甚至更多。从其中甄别出你需要的信息，反而并非易事。而且信息的制造是一种自我推进的过程，即为了处理信息，产生了更多的信息。信息的不断增多使得信息冗余数量大得无法注入人类大脑，甚至传统储藏室——图书馆——也已经无法容下了（鲍曼，2006a：19-20）。因此，若当代大学教师以向学生提供信息为己任，网络信息技术就已经宣告了教师时代的灭亡。因为对传递信息而言，教师并不比存储网络更有能力；在获取信息方面，教师不比学生具有优势。

在知识和思想方面，或许多数人对“上大学学知识”坚信不疑，但知识也是一种信息形式。利奥塔（1997：111）更是宣告，网络信息技术已经敲响了教师时代的丧钟，因为对传递确定的知识来说，存储网络比教师更有能力，所以大学教师凭借积累的知识优势教导学生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此外，知识和思想本质的区别在于：知识是物质的，思想是观念的；知识是经验的，思想是哲学的；知识是功用的，思想是自由的。虽然在知识和思想之间，很难勾勒出泾渭分明的

分界线，但是，对知识的渴望主要是为了学以致用，是物质和功利的产出，而对思想的热爱体现了对自由的追求。许小年先生曾指出，“学术就是学术，不问现实意义。胡适早就说过：‘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一句‘学以致用’，害得中国没了学术”（邓中华，2011）。胡适还对年轻人说过：“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虽然大学在是提供知识还是思想方面未必二元对立，但是与知识和功用相比，我认为大学更应该给予学生以思想和自由。

其实，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虽世殊事异，但大学功能一以贯之，即思想的发源地、自由的象牙塔。关于青年学生的思想形成，早在民国时期就有诸多极富深意的建议，如，“我们应给青年的是一个呼吸自由的氛围，不是含有窒息性的氛围；应给他们各种各式的滋养，使能各按本性去消化吸收；不应拿着某种定型去一孔出气地陶铸”（《新华日报》，1941）。早期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建议学生“睁开眼睛看事实，关于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学生有阅读自由、讨论自由、批评自由”（陶行知，1944）。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彼得·布赖恩·梅达沃爵士（Sir Peter Brian Medawar）强调了思想的重要性，他指出，“对一个学者而言，有思想是最大的成功”（利奥塔，1997：126）。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之一——陈寅恪则倡导大学教育要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么，大学教育如何才能给学生以思想呢？我认为应该考虑五个方面。

第一，学习与思考。学习的重要性无须赘述，但在学习过程中还需要不断思考。古代对此方面的论述颇多，最为耳熟能详的莫过于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第二》）和“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第十九》），以及《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此外，孟子指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思考教师所讲的和书中所述的内容，还要思考现今的社会、当下的现实和眼前的问题。然而，这种思考的习惯似乎

是现在的大学生最为缺乏的。很多学生上课就是为了通过考试和获取学分，而对所学内容少有思考。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和社会事件，他们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认为到处都一样，不必大惊小怪，从不会问个为什么，普遍患上了冷漠的大脑懒惰症。如此大学教育，“传道授业解惑”已不复存在。“传道”者变成了“传声筒”；“授业”变成授“技”或“术”；“解惑”更无从谈起，没有思考，哪有疑惑？学生只是一台台劣质复印机，忙着把课堂内容复印到笔记本上。其结果是，学生的头脑变成了别人的跑马场，真正的思想无从谈起（齐宏伟，2009）。

在一般性的思考之上，大学教育更加强调思辨的精神和能力。这正是能够真正称得上“大学”的大学和技能型的职业培训学院（或在中国已升格为“大学”的学院）的根本区别。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808: 270-272）曾指出，“没有思辨精神，就不存在科学创造力”。他还进一步指出，“学院是功能性质的，大学是思辨性质的，即哲学性质的”，因此“人们普遍承认哲学教学是大学一切活动的基础”。思考对一名大学生的学习和思想形成至关重要，而思辨对一所大学的名副其实不可或缺。但是，现今的大学践行的是一切围绕就业的实用主义和功能效用理论。有的还引入了企业化经营、公司化运作的商业管理理念。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很多大学大肆炒作、竞相攀比。校园里最为抢眼夺目的不再是学术讲座海报，而是各式各样的商业广告、学生干部竞选广告。电信公司在校园里摆摊设点，扩音喇叭里的叫卖声播放不停。本不宽敞的校园为了让车辆通行，加宽了道路；本不充足的公共空间，有的变成了小吃铺、小卖店，有的变成了收费停车场。进入大学校园，充斥耳边的不再是鸟语花香中的琅琅书声，而是车鸣声、吆喝声、人流声，喧闹不堪、嘈杂无比。今日之大学，很多早已将思辨和哲学的功能抛到九霄云外。若只以“大学”之名，行“学院”之实，实不如将“大学”更名为“学院”罢了。

第二，怀疑与批判。学习过程中的思考和思辨需要怀疑和批判的

精神。怀疑和批判是科学与思想进步的结果，这种进步也是以怀疑和批判为前提的。法国哲学家库辛认为，“批判是科学的生命”；奥地利思想家波普尔坚信，科学方法就是“批判的、论辩的，几乎是怀疑论的”，批判是科学的态度，而教条是伪科学的态度；英国数学家皮尔逊则指出，“怀疑和批判是进步的保护措施之一，科学的最不幸的前途也许是科学统治集团的成规，该集团把对它的结论的一切怀疑、对它的结果的一切批判都打上异端的烙印”（李醒民，2011）。社会学家吉登斯还断言，社会理论本质上就是社会批判（特纳，2006：450）。

在大学教育中，学生应该始终保持一种怀疑与批判的态度。首先，在阅读时，要始终带着审视的、提问的、评论的眼光，不要过于“恭敬地”“崇拜地”和“盲目地”接受书上的一切（风笑天，2001：50）。古人云，“读书贵能疑，疑能得教益”。孟子也指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其次，要对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势。在此方面，大学教师应该培养学生思考、思辨、怀疑和批判的习惯与能力。这需要大学教师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社会批判是大学教授的使命，大学教授也应该是天然的社会批判者（张意忠，2005）。但是，中国长期以来对教育和学术中的怀疑和批判存在误解，认为批判是一种全面的否定和彻底的谴责，是社会不和谐的因素；认为批判就是要反对某个人或某个组织。此外，学者在社会批判方面也“畏首畏尾——怕惹麻烦，怕得罪人，怕冒犯权威，怕触怒强权”（李醒民，2011）。其实，社会批判是对批判对象充满爱心和信心的最好体现，即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就如深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父母常常对孩子的不当行为严加责备、严厉批判，就是为了孩子能更好地成长，并超越父母。批判理论认为：

批判并不意味着谴责或抱怨某种现象或方法，也不意味着单纯地否定和驳斥某种观点，更不等于一套关于国民经济的教程和

社会生活的实践纲领。批判的含义远比“抱怨、否定或教程”深刻，它指某种理智的、最终注重实效的努力，即不满足于流行的观点、行动，不满足于不假思索地、只凭习惯而接受社会状况的努力。（霍克海默，1989：255）

社会批判的目的就是社会建设。葛剑雄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既需要肯定和维护的人，也需要怀疑和批评的人，两者缺一不可。怀疑和批评者可以使社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预防可能出现的问题。正是因为他们，这个社会才得以稳定和进步。“他们的质疑和批评或许不尽全面，但对社会起了提醒和警告的作用。对一项政策、法令、制度、措施，一项工程、规划、方案也是如此。允许并接受他们的批评，能帮助决策者更全面、更深入地考虑不利因素，从而进一步加以修改或完善。”（王君琦，2010）此外，也有人会担心，若一个人形成了怀疑和批判的习惯，并将此带到日常交往和为人处世中，会不会怀疑所有人、否定所有事呢？胡适先生早已就此问题做了澄清，即“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第三，兴趣与追求。无论是学习、学问，还是做其他任何事情，来自内心深处的兴趣是最原始、最根本的动力。如孔子所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第六》）。徐百柯在《民国风度》中介绍道，西南联大时期，逻辑学家金岳霖教授主讲逻辑学，有学生觉得这门学问十分枯燥，便好奇地问：“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曰：“我觉得它好玩。”大语言学家赵元任也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世界上很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徐百柯，2011：15）可以说，只因真正的兴趣，人们才会真正地用心，才会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用心做的事情也就不是外在于自己的，而是和自我的生活和生命融为一体（钱理群，2011a：9）。古人教导我们，只要用心专一，则金石可镂。否则无所用心，只会饱食终日。

有了兴趣和用心，学习和学术就会为了追求纯科学而将功名利禄置之度外。然而，如今的中国学者，尤其注重成果的应用、转化和推广，并美其名曰“产学研相结合”。例如，研究转基因技术的科学家公开宣称“转基因需要尽快产业化和商业化，否则会大大影响对转基因的科学研究”。真不知科学家的潜心研究与浮华的商业有何真正关联？难道科学家自己要在商海中大显身手？当然这不限于中国，在美国，“一些卑微的美国人偷取过去伟大人物的思想，通过这些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让自己富裕，他们得到的赞美高于那些提出这些思想的伟大原创者。如果这些原创者思想中有一些庸俗成分，他们早就可以做出成百种这样的应用”（罗兰，2005）。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学术研究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学者求田问舍、梦幻万贯家财，追求纯科学已成奢谈。在此情况下，若不想再次贻人笑柄，则应该谨记美国物理学家亨利·奥古斯特·罗兰（Henry Augustus Rowland）在19世纪时对中国人的这段奚落嘲讽：

我时常被问及这样的问题：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究竟哪个对世界更重要。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在科学上）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罗兰，2005）

第四，去商业化和去功利化。在商业化和市场化袭击世界各个地区和社会各个角落的背景下，学术界未能独善其身。多少学子的大学梦是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经由文凭，喜托龙门，飞黄腾达；多少农家儿女的大学梦是为了拥抱快节奏的城市现代化生活，经由大学，跳出农门，远离土地；多少年轻才俊的大学梦是为了在别人面前展示自己的成功学，经由知识，赢得盆满钵满，腰缠万贯。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并非要否定物质的重要性以及对物质的获取，而且物质化的收

益也可以是大学教育和学术事业的结果，但绝不应该是目标。如孔子所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第十四》），即学术和思想的最高目标是修身和充实自己，而不是外在的炫耀和向别人显摆。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可以“让学生的生活变得优雅，让学生变得正直”（徐晓村，2014）。一个关于古希腊著名数学家阿基米德的故事说，有一个青年问阿基米德学习几何有什么用处，阿基米德听了随即吩咐仆人：“给他点钱，让他走吧，他想靠几何学发财呢。”（王丰，2003：170）利奥塔（1997：3）更是尖锐地指出，如今知识的供应者和使用者与知识的关系，越来越具有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与商品的关系所具有的形式，即价值形式。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它不再以自身为目的。

在此情况下，作为思想的阵地和精神的堡垒，大学必须去商业化和去功利化，在商业化大潮中保持不染，与功利化现实保持距离，在雾霾笼罩和价值颓废的年代，使教育和学术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无须想象，一定会有人嘲笑这太理想主义。试问，在现实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里，若大学都不能保留一点点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何处尚能？

第五，去职业化。教育的职业化已经成为很多现代大学的办学目标和衡量标准。正如利奥塔所描述的：

（现在）大学需要培养的不再是各种理想，而是各种能力：多少医生、多少某专业的教师、多少工程师、多少管理人员，等等。知识的传递似乎不再是为了培养能够在解放之路上引导民族的精英，而是为了向系统提供能够在体制所需的语用学岗位上恰如其分地担任角色的游戏者。……大学生不再或近或远地关心社会进步、人类解放的伟大任务。（利奥塔，1997：104）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此并非否定一个社会中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职业教育固然重要，但它是众多职业教育学院承担的任务。中国也正

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并将之上升为国家战略^①。但是，不同的社会制度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如前面提及的施莱尔马赫所指明的，学院是功能性质的，也就是要承担技能性的、实用性的、职业性的教育，故称之为学院；大学则不同，它是思辨性质的、哲学性质的，故称之为大学。然而，如今的大学教育渐渐抛弃了思辨和哲学的性质，而向功能性的职业教育靠近。例如，近年来研究生教育出现了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两种，而且大有彻底变为专业型的趋势。本科教育更以就业和市场需求为最高准则。钱理群先生对此深有感触，他说：

（大学里的）一条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说是大学新生一报到，有些学校领导就约见学生家长，提出现在开始就要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做准备，要对学生进行职业的训练和指导，好像还有专门的组织，指导学生根据求职的需要来设计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还要让这些学生提前和招工单位的人事部门见面，以便公关。这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我曾经感慨应试教育之外的教育都进不了中学教育，现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机：要求大学生按照就业的需要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与就业无关的教育是不是也进不了大学教育呢？（钱理群，2008：30）

钱理群先生回忆说，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说大学不能成为职业培训班。但今天的整个教育围绕着应试和就业来展开，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他告诫我们：

大学不仅仅使你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技术、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如果不着眼于这一点，

^① 详见国务院于2014年5月2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

只是按职业知识、技能的要求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那么，大学生中的许多人就很有可能在中学成了应试机器，到大学又成了就业机器，这样来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且不说会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单就个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钱理群，2008：31）

其实，大学里的专业和社会里的职业有着本质区别。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谢弗（Richard T. Schaefer, 2006）总结道：“对于专业，顾客不太重要；而对于职业，顾客永远是对的。”对于职业来说，“顾客就是上帝”，即一定要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但是，对于大学教育中的专业来说，无论社会是否需要、学生是否喜欢，它都不能随意调整，因为一个专业意味着一套知识体系，甚至涉及某种特定的精神、特定的价值。若一味以社会需求和实践效用为导向，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岂不都得改为计算机、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之类的专业？况且，现今无论政府机关还是企业，都在不断精简机构、裁减人员。各行各业提供的岗位持续减少，而大学生、研究生规模却逐年扩大。这岂是调整专业能够解决的问题？更不用说招聘中的各种“拼爹”“萝卜招聘”等现象了。

中国大学的职业化趋势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形形色色的专业学位教育和五花八门的培训班了。大量的专业型硕士甚至专业型博士学位都是所谓的一流大学授予的。而且，越是知名学府，越容易招收到更多的学生参加各种如 MBA、EMBA、MPA、推广硕士之类的专业学位教育，越容易招到更多的学员参加各种培训班，其中不乏天价培训班。据媒体报道，国内最受社会青睐的未名湖畔从 2007 年到 2014 年共举办了 4000 多期培训班（袁汝婷等，2014）。某天晚上，我的一位在家乡乡镇工作的小学同学突然来电邀约吃饭。我好奇地问他在哪里。他说在北大上课，且他们系统来了几十号人，都在北大培训。那时，一方面我感叹北大十分接地气，另一方面其多年来在我心中的神圣感也荡然无存。其实，大学与最基层的社会单元建立真正的联结，

关心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恰恰能够彰显公立大学的社会责任感，而且有助于学术研究中的社会批判和理论思辨。但是，不知有哪所大学能够勇敢地宣布其专业学位教育和花样繁多的培训班是为了思想的传播，而非经济收入？在“拽人名、拽校名”流行的现今社会，尤其在官场和商场，谁不愿意在言语中、在简历里沾上个北大、清华的名字？如此一来，在专业学位教育和培训市场上，招生的容易程度和招到学生的数量随着学校名气的下降而降低和减少，即只有在知名度高的学校满足收益预期时，才会轮到其后的学校。这完全符合经济学中的滴流效应。

综上所述，我想强调的是，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存储网络已经完全取代了教师的知识和信息积累等传统优势，当代大学教师不能再以向学生提供不确定的信息和确定的知识为己任，大学应该回归其思辨和哲学性质，尤其需要给学生以自由的思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学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思考与思辨能力、怀疑与批判意识，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和追求纯学术的精神；大学教育本身应该去商业化、去功利化、去职业化。而大学学习的一个主要方式便是读书，教师可以协助学生读书，多读书，要“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可以肯定的是，若一名学生在大学期间不断读书，读了很多书，那么与其他活动所带来的任何外在荣誉相比，他（她）一定能够感受到更高层次的快乐和享受，且一生受用，否则定会惋惜不已。钱理群先生建议大学生要“沉潜十年”读书：

我们的教育，最大的失败就在于，把如此有趣、如此让人神往的读书变得如此功利、如此的累，让学生害怕读书。……学生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生活的现实空间是相对狭窄的，而他的精神生活的空间却是无限广阔的。其主要途径就是读书。而读书，就是和古今中外的没有见过面的朋友进行心灵的对话，精神的交流。……这是一个自由读书的大好时机，大学、研究生期间，应该把精力集中在读书上，特别在阅读经典原著上好好下工